

I loved not wisely, but too well.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凤。
长记欲别时，和泪出门相送。
如梦，如梦，
残月落花烟重。

伶人·武士·猎手

后唐庄宗李存勖传

戴仁柱 马佳 著

中华书局

伶人·武士·猎手

后唐庄宗李存勖传

戴仁柱 马佳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伶人·武士·猎手:后唐庄宗李存勖传/戴仁柱,马佳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9.11

ISBN 978-7-101-07003-3

I. 伶… II. ①戴…②马… III. 李存勖(公元885~
926) — 传记 IV. K82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3466号

-
- 书 名 伶人·武士·猎手
——后唐庄宗李存勖传
- 著 者 戴仁柱 马 佳
- 责任编辑 王 芳
-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版 次 2009年11月北京第1版
200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规 格 开本/700×1000毫米 1/16
印张14½ 插页2 字数160千字
- 印 数 1-5000册
-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7003-3
- 定 价 29.00元
-

序

2004年3月戴仁柱(Richard L. Davis)历十年之工的《新五代史》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是年夏天和2005年的春天,戴仁柱继续在台湾从事五代史的研究,同时,写作一本五代第二代开国皇帝庄宗传记的念头也逐渐地明晰起来。五代虽是个分裂、动乱的时期,但它前承唐代,后启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其实是无法回避、不可忽视的。在整个五代的五个朝代中,后唐不但占据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沙陀人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加之,沙陀虽然是来自中国大陆北方的游牧民族,但却以复辟唐朝为己任。而凡此种在中国古代史史学界却鲜为学者们关注。在长期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戴仁柱越来越觉得传记作品是帮助读者和学生全面认识、深入了解历史的一个生动的形式。这些原因成为了戴仁柱写作英文后唐庄宗李存勖传记的最初动因。而2005年4月的太原(即古时的晋阳)之行,让戴仁柱切身感受到了太原作为后唐发轫之地,其深厚博大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了他传记写作的一道源源活水。

戴仁柱和马佳最初于1995年相识于南京大学,后又在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同事两年(2002—2004),其间,戴仁柱为历史系教授及东亚系主任,马佳则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两人在茶余饭后、学间课下,常常兴趣盎然于中国文化和历史。马佳介绍了戴仁柱风格卓异的代表作《山下有风——十三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危机》。在英译本《新五代史》出版后,马佳又将其前言的



主要部分翻译成中文。

从2005年春天开始到2006年底，戴仁柱完成了《庄宗传》的英文原稿。1996年到1998年两年在台湾中正大学任教，2006年起又受聘于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的经历，使他考虑到中文背景的读者，包括学生，应该会对庄宗这样一个相对并不知名的中国古代皇帝，比西方读者更感兴趣；另外，他觉得一本以自己的研究为基础的中文著作，可以给大学的学生增添新的、别开生面的历史辅助读物。

于是，戴仁柱和马佳商议，在英文原稿的基础上，共同创作一部中文本的《庄宗传》。它应该既有学术价值，但又力求雅俗共赏，意趣盎然。一句话，我们希望这部别开生面的《庄宗传》能够为专家和普通读者所共同悦纳。戴仁柱的汉语在国际汉学界少有比肩者，古汉语尤佳。马佳出身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之后游学任教于欧美，近来更涉足传记写作、文化研究和英语翻译的诸多领域。两人各有所长，互有所补，彼此的合作显得自然而默契。

合作始于2007年的秋天，历时一年多。其间，戴仁柱受聘担任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马佳任教于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东亚中心以及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语言和文学系。工作的程序为马佳先按照英文原文草译，然后经戴仁柱修正，马佳再据此完成初稿，最后，两人又根据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加以删减增补，形成定稿。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在初稿中有多达九百条的尾注，包括正文中对话的文言文引文和一手、二手资料的出处，但考虑到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我们将其悉数删去。但所有的尾注都保留着，有兴趣者可以直接和戴仁柱教授联系。

有三本关于五代(907—979)的官方史书。时间上最接近五代的《旧五代史》，是宋初由薛居正主持编撰的官修史书。最通行的却是《新五代史》，它是由欧阳修个人编撰的，作者去世后的1077年由宋官方出版，当初的书名是《五代史记》。即便当时是独立完成的，但由于是官方出版印刷，此书也被认为是官



史。可以说,《新五代史》是《旧五代史》的重要补充。

欧阳修也是官史《新唐书》的主编,他当时可以广泛涉猎大量在开封的官方图书馆(秘书省)和私人的藏书。这些藏书包括失传的五代史录、国史和有文学色彩的历史故事——笔记小说。《新五代史》写作风格既简洁明了,同时也富有故事性,引人入胜。其中也贯穿了作者基于儒家思想的写作观念。无疑,《新五代史》较之《旧五代史》更加流畅,但因为前者是后者的缩编,所以,《新五代史》缺乏《旧五代史》在史料上的丰富和完整。共同点是这两本史书都是以纪传体的体例写就。

涉及到五代的第三本官方史书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后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七年出版。本书采用了编年史的体例,所以在研究、观察五代历史变迁方面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共有二百九十四卷的《资治通鉴》涵盖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后959年的历史,最后的三十卷是关于五代的。《资治通鉴》在宋官方的赞助下由司马光主编,本书的作者们参考了新旧两本五代史,以及现在散佚的其他史书。司马光在后唐的都城洛阳进行《资治通鉴》的编辑工作,洛阳很可能藏有开封所没有的史料(而欧阳修是呆在开封做官和从事历史研究的)。由于《资治通鉴》参考了大量的史料,加上它庞大的作者群,所以被称为是最完备、最客观的中国古代史书。

因为这三本史书各有优劣,所以,戴仁柱在参考引用时没有过分倚重其中的任何一本。最主要的五代制度史《五代会要》存在着大量的错误,所以戴仁柱在引用本书的史料时非常小心。另外应当提及的是宋初所编的《册府元龟》,其中包含了大量五代流传下来的笔记小说和典故,此书先前也为欧阳修和司马光经常引用。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11世纪的两本史书——《新五代史》和《资治通鉴》,成书于庄宗李存勖死后一百五十年,但同样包含着对庄宗的偏见,《新五代史》甚至更甚于《资治通鉴》。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庄宗的负面评价逐渐地固



定。自清以来,大量的历史学家更看重《旧五代史》的主要原因是它没像其他的史书那样对史料明显地加以“过滤”。现存的《旧五代史》的版本是18世纪时拼凑起来的,所以在不少关键的地方是不完整的。《旧五代史》包含了很详尽的庄宗本纪,加上本书中关于庄宗母亲曹氏和儿子李继发的传,没有它,戴仁柱不可能完成此著。但《旧五代史》中缺乏两位刘氏的传记,她们分别是庄宗的正妻和后母。《旧五代史》明显的缺陷使得戴仁柱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新五代史》和《资治通鉴》,虽然后两者是在五代一百五十年后编撰的,准确地说应该是二手资料。

由于庄宗在位时间短暂,使得有关他的史料存有相当的偏见。庄宗的继承者明宗李嗣源,在位八年,有足够的时间来塑造庄宗的历史形象:为了证明其篡位的合法性,庄宗必须要被贬低。所以,很明显,当时的史料经过了系统的处理。历史上对庄宗李存勖的评价始于新旧五代史。《旧五代史》列数了导致同光王朝速亡的诸多原因,像外用伶人,内惧刘氏,吝啬敛财,滥杀重臣,认为以上任何一项就可以导致一个王朝的夭折。《新五代史》则强调庄宗重用伶官,作为沙陀皇帝,他有着本性上的缺陷。但结论几乎是一样的:《旧五代史》说“得之孔劳,失之何速”?《新五代史》言“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之后,史学界基本沿用了这样的结论,将庄宗视为骄奢淫逸、无所作为的帝王。

我们的《庄宗传》试图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给当代的读者呈现庄宗的形象。作为一个普通人,庄宗李存勖性格丰富,自然率真,极具传奇色彩。他自幼喜好演剧,写过剧本,上过舞台,甚至还填过词;他英勇善战,常常为士卒先;他是个著名的孝子,不仅早年以父亲的遗愿为己任,同时对母亲几乎言听计从,很少违拗;他又酷爱打猎,喜好赌博,擅长鞠球。作为第一个沙陀血统的皇帝,他和他之前以及之后的开国之君一样,还是个马背上的皇帝,脱不了武士的性情,没能及时转换角色,自然不善朝政。他基本保持了做晋王时的散淡优游,漠视儒家的道德传统、礼仪制度,例如,他竟然会叩拜一个胡僧。之类的行径使得朝廷内



外的士大夫侧目反感,严重地影响了作为一个传统中原皇帝的尊严和威望。以沙陀传承继位的传统,庄宗李存勖二十四岁即位晋王,三十九岁成为同光皇帝,都显得过于年轻,不够成熟,缺乏统治手段和治国方略。

李存勖作为皇帝,也并非一事无成,比如他的治下,将蜀纳入后唐版图,这在整个五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试图打破唐朝以门第、出身作为为官方标尺所造成的门阀体系以及取士不公的弊端,像主动干预科举考试,让平民寒士桑维翰得以被公正录取。他在做晋王时,就曾经吸引了大批的人才,如冯道、卢程等英杰皆入其彀中;他也提拔和培养了军中的人才,像石敬瑭(后晋皇帝)、刘知远(后汉皇帝);他基本能做到举贤荐能,不盲目地任用家人。另一方面,他既不像后梁朱温那样残暴,也没有蜀国王衍的奢侈。所以,将庄宗放在五代的历史环境中,能够在功绩上超过他的皇帝也不过一二,而他在文采和性情上甚至可以和南唐的李煜一比,早年征战中的智勇双全更是直追唐太宗李世民。正如吕思勉所言:“后唐庄宗为人,颇似唐太宗,其用兵之剽悍或且过之,然政事之材则远落其后。”可惜的是,和早期太宗相似的庄宗在后唐统治的高峰就迅速陨落。

总之,我们认同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因为任何历史都会被后人评说,为历史学家审视,成为当代社会的借鉴,但真正有价值的历史书籍一定是基于丰富翔实的史料之上的历史言说。所以,我们希望读者在这本《庄宗传》中能得到一个关于庄宗李存勖全面、新鲜的形象,从而能更深入内在地理解五代这段特殊的历史。

戴仁柱(香港) 马 佳(多伦多)

2008年8月初稿

2008年12月改定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天才与浪子	1
父辈的血性	5
汉文明的浸淫	14
宫廷核心层	23
第二章 诸王逐鹿	35
父王之弟及养子	38
结盟与赵	42
灭燕复仇	51
马刀声声惊魏州	58
汉人和“蛮夷”	69
南下攻坚	75
祸起萧墙	82
力挺旧盟	85

走向后唐	89
动荡不止	93

第三章 复辟唐朝	95
复辟盛唐	97
开封崩溃	102
巩固实力	112
宦官、伶人	118
家族庆典	125
结善邻邦	130
文化角力	134
兄弟阋于墙	144
华美和奢靡	147

第四章 暴风骤雨	151
家人之死	153
中宫擅权	159
伐蜀前后	163
得蜀不偿失	168
严冬漫漫	176
魏州梦魇	183
众叛亲离	192

第五章 历史之手	199
-----------------	-----

庄宗大事年表	211
--------	-----

第一章



天才与浪子



后唐庄宗立像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浩如烟海的历史中，夹在唐宋两大王朝之间仅仅五十余年的五代颇似一个陪嫁的丫环，叨陪末席或少人问津，从不给人以惊诧。但当我们拂去笼罩其上的历史尘埃，便会倏然发现，她却原来也是这历史大观园中一道自有风姿的景观。循着她的回眸深望，这段被史家冠之以杀戮频仍、充满刀光剑影、王朝国度更迭无常、城头瞬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却一样有着哀婉动人的情节，曲折、离奇的故事，以及催人警醒的喻示。

作为五代第二代王朝——后唐的开国之君，李存勖自幼便处在两种文化的交织沐浴下，成为那个时代令人艳羡的佼佼者。李存勖本为沙陀人，加上父亲——晋王李克用的刻意训练，使他显现出典型的突厥沙陀勇士般强健的体型和勇猛的胆略。几乎与此同时，出身汉贵族的母亲成为他最好的家庭教师，还有那些出入宫廷的汉族背景的官吏、辅臣，他们也常常簇拥在小存勖的周围，可以想见李存勖对汉文化如鱼得水似的亲近。后来，他常常自矜于对文言和白话的自如运用，对中国历史和典籍的信手拈来，对吟诗作赋的灵巧熟捻，以及作为伶人的天分。不仅如此，汉文化中成熟的政治体系和典章制度，也让这位一度的中原之王获益匪浅。当然，李存勖也醉心于自己的本土文化——那些特有的宗教礼仪，以及由摔跤、斗鸡和远途狩猎组成的休闲活动。最终，李存勖凭借着过人的才干和得天独厚的文化素养凝聚军心民意，夺得江山，也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

李存勖一生的使命似乎自出生之日起便已然设定，父亲李克用毫无迟疑地把未来的宏图大略压在幼年的长子身上。一次，刚刚取胜的李克用设宴款待部下将校，席间，他先以充满爱怜的目光紧盯着侍坐一侧的爱子，接着对手下毋庸置疑地预言道：“我已经垂垂老矣，但我这个儿子却是块好料子！以后就靠他替我征战沙场了！”这时，存勖也就是四岁的年纪，比起同龄的穿着后开衩裤的同伴不过个头稍高。但从此，父亲的这番预言便没有在李存勖的耳际消失过，成为他建国立业的座右铭。常年征战而铁石心肠的李克用惟独对大儿子宠爱有



加，儿子则知恩图报，将父亲的三项遗愿当作一生的矢志追求。

正是绝好地应验了那句俗语：自古英雄出少年。弱冠之半的李存勖常常随父征战，代父行事。一次战后，李存勖代表父亲赴唐都向宫廷报捷，唐昭宗被其勇武健硕的沙陀勇士的外貌所吸引，对其不吝褒奖。在895年夏末接见李存勖时又预言：“你小小年纪便仪表堂堂，我看你日后一定会荣华富贵，前程无量，可别忘了我大唐帝国和你父亲的栽培。”昭宗随后拿十一岁的李存勖和其父——四十壮年、正处在权力巅峰的李克用相比较，慨然道：“这孩子以后会超过自己的父亲。”（“此子可亚其父。”）于是，李存勖便有了“亚子”的绰号，意为后来者居上。唐昭宗的这番赞誉很快便传到晋王的耳中，这也正契合他对儿子自幼的厚望，于是，李克用刻意将李存勖的神勇夸大到极致，他要遍晓天下，他的这位将门虎子会将家族的荣耀发挥到极致，他治下的晋阳也会出现令人瞩目的壮丽景象。李克用后来又有了四个儿子，但他始终将长子李存勖作为可以实现其王国梦想的当然人选。

有了这样的野心，为唐王朝效命并被赐皇姓的晋王李克用当然清楚汉文化在打造李存勖心智方面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着不凡的汉文化背景的妻子在其间更是不遗余力。据史传，李存勖“十三读春秋，略知大意”，加上儒家经典的浸染，以此平衡了他在文学、音乐和戏剧上的天赋。另外，幼年的李存勖还饱读了《孙子兵法》等相关的兵书，这些典型的中国军事智慧集成显然加强了李存勖日后的军事指挥才能，使他鹤立于同时代沙陀出身的将官。

庄宗李存勖另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会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形下对家人和臣民鲜明地展现出其迥异的形象。历史学家常常将庄宗描述成具有无法言喻的矛盾个性的人：执着决断，却又专横自私；亲切随和，却又冷漠寡趣。撇开他的个性不谈，李存勖自我文化认同的意念，也为他的矛盾心理和前后不一提供了另一个渊源：年轻时为其汉文化的身份而沾沾自喜，但日后却偏向游牧文化，热衷于礼仪和宗教活动。我们估计，李存勖在晋阳时，有意识地培养起了



一个能够取悦他的近臣和母亲的形象；但一旦大权在握，他内在的对周遭沙陀族人的同情便占了上风，使他有意识地采取行动去趋近、安抚他们。相对于粉饰加工后的形象，其实，李存勖的身份在年轻时要比史料所言更少汉文化的成分，而其登基后则比通常所说的要更少沙陀色彩。贯穿李存勖一生的，是他丝毫不放松地运用他的形象，来服务于个人和政治错综复杂的需要。不像他的父亲李克用，他从未享受过他本真的个性。

当代的研究者服膺于这样的见证：庄宗李存勖登基后，历年不知变通的宫廷政策和策略造成了君臣之间的日渐疏离；而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专注于立国后庄宗生活环境和精神世界的逆转：一个惯于驰骋疆场的勇士在炫目繁缛的宫廷生活中，日渐失去了他当初的修炼和气质；历代的儒家学者则在道德伦理的层面上反复论证庄宗堕落的生活和怪异的统治手段，是导致他迅速覆灭的致命组合。总之，学术界从不同的层面对庄宗李存勖这样一位特殊的历史人物，多为情绪化的评判乃至针砭，但却缺乏系统、理性的分析和研究。此外，包括研究者在内的所有人，对李存勖的英雄传奇和他后期流星般的短命统治兴趣盎然，但对隐含在他传奇故事之中的文化伦理资讯却并无热忱。的确，这位异族统治者生前丰富的资材足以取悦普通的读者，因而，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庄宗，这位早期征战沙场的勇士和后期宫廷舞台个性卓异的表演者（他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天才的伶人），为他死后的娱乐消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

父辈的血性

作为沙陀后裔，李存勖的身份是由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决定的。沙陀四处飘移的历史联系着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几个世纪的大迁徙。关于沙陀人的历史记载迟至唐朝（618—907）才出现。他们也许曾经有过不同的称呼，但按照中国古代史家大同小异的说法，可能性最大的是，在更大范围的中国北部边界的部



落群中,沙陀是一个融合了其他部落的整合。唐朝历史中,“以夷制夷”是一个不曾间断的国策,因而在唐朝后期,沙陀逐渐成为朝廷的雇佣军,用以抵御外敌的进攻。他们曾经在一块相当大的区域靠牧养生存,这一地区向南一直延伸到新疆和内蒙古。沙陀人放牧马和羊,畜产品部分供自己消费,部分和南方的边民交换。突厥人在7世纪和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控制了这片四面延伸的边界地盘,沙陀人很可能是其多元文化伞翼下的一个部落种族。

据相关史料记载,当初沙陀曾被冠以“沙陀突厥辖区”,偶尔也称作“沙陀三部落”,说明后来的沙陀是由过去的多个部落联盟整合为一的,如上段所言。8世纪突厥的衰落恰好助成了沙陀的崛起。沙陀的军队在晚唐的大部分时间内并没有超出三万人的规模,按照间接的估算,其中大概有七千骑兵。虽然人数不多,但旁人难以企及的高超箭术和作战时的勇敢使沙陀士兵显得异常勇猛。的确,沙陀最好的弓箭手有足够的力量射穿任何敌人的盾牌。沙陀曾在8世纪中叶到晚期和回鹘人、吐蕃人间歇地合作,9世纪初这两支北方的势力衰败后,联盟解散,于是,他们皆投奔中原唐朝。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随着走出戈壁草原向长城以南扩张,沙陀的自主意识越来越强烈。

公元809年以后,相当有规模的一支突厥沙陀人再次在河东和代北以北地区(即后来的山西,古称晋)安顿下来,这个地区从太原平原向北一直延伸到大同。这里干旱的土层和稀疏的植被适合放牧和狩猎,因此这些突厥沙陀人便选择它作为永久的居住繁衍之地。向南的迁徙自然加强了和当时汉帝国的频繁联系,因此在9世纪初,唐朝的一些将领开始招募善斗好战的沙陀人来对抗内乱。沙陀军事战略价值的提升使得他们的人口有了惊人的增长。有历史学家估计,将平民和军人都计算在内,他们的人口在9世纪末达十万之众。但这个估计明显是保守的:在主要战役中通常将其他内陆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包括在内的方法影响了对沙陀人口单独统计的准确性,而这一做法是当时所有人口统计的基准。另外,沙陀人自己也有意识地加快了人口的增长,到了9世纪末,他们



吸收了别的草原部落,扩大了和汉人的通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只有部分突厥血统的新族裔。10世纪初,日益衰弱的唐王朝踉跄地走向崩溃边缘,为了制止这样的趋势,对沙陀人的需求日益增加,使得沙陀在晚唐的社会声望也不断地提高,结果是这个昔日的河东居民成为了这个时期唐朝国家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另一方面,持续地和中原帝国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最终使沙陀在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了变化,包括文字。

沙陀原本没有自己的书写系统,甚至连简单的姓氏也没有。“夷狄无姓氏,朱邪,部族之号耳”,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如是说。显然,欧阳修的说法有言过其实之处,不仅如此,他还将此推衍到几乎所有的北方少数民族。但对于突厥沙陀人,获取姓氏的方法的确是在其历史的后期,很可能模仿了汉人的做法。李存勖的祖父,名为朱邪赤心(?—888),朱邪其实是部落的名称,是“处月”的音译,但却被不少后来者误认为姓氏。当唐朝廷赐他李姓名国昌后,他便在870年停止使用朱邪的称呼。之前,李存勖的曾祖父也有汉人的姓名,叫李友金。

赠与新近的被降伏者或不易对付的北方少数民族以皇家姓氏和汉名,不仅表示最高礼遇和恩赐,同时也潜含着将其纳入唐朝的隶属范畴。其实,这样的行为是出于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量,也就是说,通过认可某些区域为唐属国借以减轻威胁。对于唐朝来说,赐封像沙陀那样的首领名号和官职已成为皇族延续的一种象征,而对于某些少数族裔来说,则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提升。因此,双方一拍即合,各取所需,唐朝这种明显带有政治目的的做法受到了李国昌或者其子李克用的欣然悦纳。十五岁左右李克用被冠以此名,他对自己的汉名如此钟情,以至于以前的突厥原名已不复出现在史书中。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身上。发展到后来,沙陀原名便成了一种咒语,禁止提及,破坏禁忌的人甚至会丢掉性命。

尽管唐王朝急于利用沙陀为自己服务,但有时沙陀一厢情愿的热诚却让唐